

《周易》中道與吉凶悔吝

——基於道德形而上學的詮釋路徑

馬俊

中文摘要

“中道”思想是《易經》的一個重要思想，其本意表示卦爻的履中得位，包括“中正”和“時中”兩個維度。凡符合“中道”的爻多吉而少凶，這反映了一種素樸的人生哲理。“中道”思想在《易傳》中被加以提煉和發展，並引申為一種重要的道德觀念。《易傳》通過賦予作為宇宙本體的天道以全新的道德意義，從而溝通了德行與吉凶之間的鴻溝，揭櫫了君子進德修業的合理性，並進而確證德福之間的一致性。這一道德形而上學的詮釋路徑包涵了宇宙論和本體論兩個層面，對後世儒家產生了深遠影響。

關鍵詞：周易，中道，吉凶悔吝，道德形而上學，德福一致

* 馬俊：中國人民大學 哲學院 博士研究生。
(knowinyourself@163.com)

《易》本卜筮之書，其最初目的是用於占卜祭祀、預測吉凶的，這是易學界的一般性結論。但《周易》是如何將卦爻與吉凶聯繫在一起的？或者說卦爻在時空中間的變化是如何與吉凶禍福聯繫起來的？這一問題在過去並沒有完全得到解決，通過《周易》的“中道”思想或許可以深入這一問題的根部。“中”在《易經》中本是描述爻位關係的概念，在《易傳》中則又引申為一種道德觀念。《易經》有尚中崇正的價值取向，所謂“二爻多譽，五爻多功”，在易爻中，凡中、正之爻，皆多吉而少凶。三百八十四爻中，符合“中正”的爻凡六十四，主吉亨者十占其九。這說明“中道”與吉凶之間似乎存在某種統計學上的關聯。那麼這種關聯說明了什麼？要解釋這一現象，必須先理解《周易》“中道”思想的真正內涵。

一、《周易》“中道”觀的時空維度

“中道”思想是《周易》中的重要思想，程頤曾指出“天下之理，莫善於中。”¹ 錢大昕也說：“《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一言以蔽之，曰中而已矣。”² 這些說法道出了“中道”思想在《周易》中的重要性。析而言之，《周易》的“中道”觀是在兩個維度上展開的：一個是空間的維度，一個是時間的維度。前者以蘊涵在卦爻辭之中的“中正”思想為代表；後者以爻位變動所透發的“時中”思想為代表，兩者結合起來才是《周易》“中道”觀之全璧。

首先，在卦爻辭之中，“中道”常被表述為“中”、“正”這一對概念，二者在《易經》中本是描述爻位關係的兩個概念。“中”指爻位處於內外兩卦之中，“正”則指陰陽當位。例如一卦之中，有兩個中爻，即第二爻和第五爻，二爻為內卦之中，五爻為外卦之中。陰爻居中稱“柔中”，陽爻居中則稱“剛中”。陰爻居陰位，陽爻居陽位，即謂之“正”，又稱“當位”。九二，陽爻居中，則為不正；六五，陰爻居中，亦非正位。如果陰爻居內卦之中，陽爻居外卦之中，如六二和九五，則是既中且正，謂之“中正”。在《易經》中尚未見“中正”二字連用，與之意義相近的是“中行”（即“中以行之”之意），共有五處。在《易傳》中，“中正”二字連用共有十七處，如“龍德中正”、“剛建中正”等。“正中”有五處，如“位正中”、“龍德而正中”等。而分述“中”與“正”的記載，則多達四十餘卦，如“中以行正”、“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也”等。可見在《易傳》中用“中正”來描述爻位關係是十分普遍的。“中道”與“正道”兩個概念之間也存在著密切聯繫：一方面，二者在內

1 程頤，《周易程氏傳》，頁297。

2 錢大昕，《潛研堂集》，頁39。

涵上有交集，趙歧《孟子注疏》云：“中道，中正之大道也。”³ 高亨也指出：“中則必正，正則必中。中正二名，實為一義。”⁴ 可見“中道”和“正道”是相涵相攝的，“中道”包涵著“正道”，“正道”又蘊含著“中道”，二者互為補充，有機統一。另一方面，“中道”又可以統攝“正道”，考諸爻辭，許多中爻雖不當位卻仍以吉居多。關於這一點，程頤早已指出，他說：“不失中，則不違於正矣，所以中為貴也。諸卦二五雖不當位，多以中為美。三四雖當位，或以不中為過。中常重於正也。蓋中則不違於正，正不必中也。”⁵ 可見，在《易經》中，“中道”是優於“正道”的。

其次，在《周易》中還出現了“時中”的表述，《象·蒙》曰：“蒙亨，以亨行時中也。”這裡的“時中”，原義當為時間之中，引申為合適的時機。孔子有“君子而時中”一語，意為君子時時刻刻都持守中道，這是孔子對“時中”概念的發展。實際上，“時中”是《周易》的一個重要原則，也是儒家的重要思想之一，惠棟曾說：“易道深矣，一言以蔽之，曰時中。”⁶ “時中”概念是後世儒家從《周易》古經中抉發出來的深刻哲理，孔子的中庸思想亦與《易經》的“中道”觀有莫大關聯，他對《易經》“時”的哲理深有造詣，故孟子說他是“聖之時者”。在《周易》中，“時”與“中道”一開始就是聯繫在一起的，用“時中”這一概念來概括這種聯繫是十分貼切的，正如程頤所說：“時謂得君之應，中謂處得其中，得中則時也。”⁷ “時”與“中”本是一事，只是稱呼不同而已，得中則得時，二者不能割裂。另外，“時”與“變”也是聯繫在一起的，《繫辭》說“變通配四時”，“時中”的哲學就是教人在變動中把握時機、掌握變化的規律。《周易》中的每一卦就是一種“時”，六十四卦就是六十四種“時”，如《泰》卦象徵通泰之時，《訟》卦象徵爭訟之時，《周易》就是指導人們如何在這六十四種“時”中轉危為安、安身立命。

《易》古經關於“中正”、“時中”等思想的闡發，可以視作《周易》“中道”思想的雛形。其中“中正”是從爻位關係上闡發“中道”，“時中”則是從時間變化中闡發“中道”，二者結合起來就是完整的時空上的“中道”觀。

二、《易傳》對卦爻辭的道德化詮釋

在《周易》中，無論是“中正”還是“時中”，其本意均是從卜筮符號中引申出來的概念，並不具有純粹的道德意義，但在後來的演變過程中逐漸具有了道德的意義，如《象·同人》：“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

3 趙歧注，孫奭疏，《孟子注疏·十三經注疏整理本》，頁476。

4 高亨，《周易大傳今注》，頁41。

5 程頤，《周易程氏傳》，頁296。

6 惠棟，《漢易學·易尚時中說》，頁62。

7 程頤，《周易程氏傳》，頁27。

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君子守持正道，故能有應，故能通天下之志。可見在《易傳》中，“中正”、“時中”等概念已經被提煉出來，上升為一種比較純粹的道德概念。同時，在《易傳》中，“中道”還與天命聯繫在一起。如《象·無妄》曰：“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又如《象·姤》：“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捨命也。”“中正”被描述成天命的特質，這裡面包涵了人們對上天的神靈式的想像。《易經》通過一套特殊的符號體系預測吉凶禍福，其卦爻辭折射出了巫史文明中的先民試圖把握自然規律的努力嘗試，而《易傳》對《易經》的道德化詮釋，則又賦予了其嶄新的含義。如果說“中道”的道德屬性在《易》古經中還只是隱含著的，那麼在《易傳》中則上升到了自覺的層次。

實際上，《易傳》常以“中道”作為解釋卦、爻辭的普遍法則加以運用。在《周易》的語境中，“中道”有正確、原則的含義。在一定的條件下做出正確的行為，這是“中行”，如《泰》卦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於中行”；在一定時勢背景下做出正確的舉動，這是“時中”，如《象·蒙》曰：“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在《周易》中，“中道”是趨吉避凶的內在原因，舉《訟卦》為例，其象辭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於淵也。”“訟”本來是爭的意思，《周易正義》云：“凡訟者，物有不和，情相乖爭而致其訟。”⁸《訟卦》象辭中有“上剛下險”、“有孚窒”、“終凶”等語，這表明《訟卦》是不太吉利的一卦，但九五卻能“訟元吉”，這是為什麼呢？原因是“尚中正”。《易傳》認為君子反身修德，守持正固，必可致亨通。“所以訟得大吉者，以九五處中而得正位，中則不有過差，正則不有邪曲，中正為德，故元吉。”⁹《訟》卦九五爻處中而得正，以中正為德，因此其卦辭最終為吉。像這樣的例子在《周易》中還有許多，可見“中道”作為君子之德，構成了規避凶厲悔吝的內在根據。君子以“中道”行事，則雖履險地亦無咎害。

《易》古經以鬼神之事、幽冥之說來說明道德與吉凶之間的關係，《易傳》則將卦爻與德行直接聯繫起來，並加以道德化的詮釋。“中正”、“時中”這兩個卜筮概念正是在這一價值取向的助推下，昇華成一種具有純粹道德意味的觀念——中道，而這一道德的概念，反過來又成了解釋吉凶禍福的內在邏輯。來知德說：“聖人一部《易經》，皆利於正，蓋以道義配禍福也，故為聖人之書。”¹⁰也就是說，將道義與禍福聯繫起來闡發中正大道，這是《周易》稱為聖人之書的原因。應當指出，《易傳》雖然運用“中道”觀來解釋吉凶禍福，但並未獨斷論的肯定二者之間的一致性，“中道”與吉凶之間的關係並不構成充要條件。舉例來說，《剝》卦六二爻：“剝床以辨，

8 王弼、孔穎達，《周易正義》，頁45。

9 王弼、孔穎達，《周易正義》，頁49。

10 來知德，《來氏易注》，頁327。

蔑，貞凶。”此爻既中且正，爻辭卻貞凶，原因出在六二與六五無應。《周易折中》引龔煥曰：“六二陰柔中正，使上有陽剛之與，則必應之助之，而不為剝矣。惟其無與，所以雜於群陰之中而為剝。若三則有與，故雖不如二之中正，而得無咎。”¹¹ 這裡的解釋工具不僅涉及“中”、“正”，還牽連到比應關係，由此可見，行為合乎“中道”並不必然導致吉。實際上，“中道”只能是趨吉避凶的必要條件，也就是說，行為合乎中道並不必然導致吉，但行為違背中道必然不會導致吉。從這一意義來看，《周易》所預測的吉凶，並非命定論的，而是指導人在特定的境況中作出符合天道的行為，進而把握個人的命運。《周易》處處教人持中守正，遵循“中道”，其背後的原因即在於此。孔子說：“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論語·憲問》）孟子也說：“知命者不立乎岩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孟子·盡心上》）根據天道的原則，在變動中把握自身的命運，孔孟這種天命觀正是《周易》理解人生的一種生動的詮釋。

君子尊奉“中道”而行，常常能夠趨吉避凶、化險為夷。先民們從生活經驗中體會到了這一哲理，並將之融入到《周易》的撰寫之中，並形諸卦爻的表現形式，用以指導人們生產、生活的實踐，這大約是中道思想的最初源頭。然而在義理派看來，《周易》最核心的東西就隱藏在這些義理思想之中，卦爻辭不過是藉以表達義理的手段而已。後人讀《易》，得魚而忘荃，吸取了其中的義理思想，並將其逐漸從象數之中剝離開來，使其具有了獨立的地位，《易傳》對《易經》的道德化詮釋正是這方面的代表。既然掌握了《易經》最為核心的義理思想，那麼也就可以拋開占筮卜卦這些原始儀式了，於是便有了“善易者不占”這樣的說法。真正的“善易者”根據易理來行事，而非占卜所得的卦爻辭。“善易者不占”的背後，透露出了義理與卜筮相分離這一歷史事實。“中道”思想正是在這一思想背景之下，逐漸與卦爻相脫離並朝形而上的方向發展。從此道德與吉凶直接聯繫在了一起，中間去除了卜筮這一橋樑，這是《易傳》對《易》古經的重要發展。

三、天命與德性：中道與吉凶悔吝的形上聯繫

既然中道構成了趨吉避凶的必要條件，那麼這種必要條件的根據又來源於何處？或者說，《周易》憑什麼認為“中道”能夠趨吉避凶？這是《周易》古經“中道”論的理論難點。深入考察，《周易》古經似乎蘊含了一種樸素的“德福一致”的思想，即認為有德行的君子必然能夠獲得福報。但問題是，德行何以能夠引導人趨吉避凶？或者說，道德本身與道德行為結果之間的一致性如何可能？在《易》古經的卜筮話語中，道德與吉凶悔吝之間的一致性是通過“卜筮神學”來保證的，或者說“卜筮神學”充當了德與福之

11 李光地，《周易折中》，頁662。

間的橋樑。然而這在理性面前顯然不具有說服力。《易》古經中留下的問題，在《易傳》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決。《易傳》放棄了“卜筮神學”的詮釋路徑，而是從道德形而上學的徑向來說明道德與吉凶之間的一致性，這一詮釋路徑十分獨特，既包涵宇宙論也包括本體論，以下分而述之。

首先，從宇宙論層面來看，《易傳》構建了一個以太極（或天道）為本源的宇宙創生模式，這一模式將天、地、人三者通過一種本體論的生發關係緊密聯繫在一起。《繫辭》云：“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王弼以“無”釋太極，孔穎達以“元氣”釋太極，¹² 朱熹則以“理”釋太極。¹³ 不管是“無”還是“氣”抑或是“理”，這裡的太極具備三方面的重要意義：第一，太極具有宇宙本體、萬物本源的意義。所謂“形而上者謂之道”，太極就是這個形而上的道體，處於邏輯的最高層次。第二，太極是陰陽對立的統一體。陰陽雙方相反相成，統一於太極，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正因為太極統攝陰陽，具有對立統一的特質，才能產生變化，也才能化生萬物。第三，《易傳》的宇宙本體是生成論意義上的本體，萬物皆從太極這個本源生發出來。所謂“生生之謂易”、“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是易道的一個根本屬性。根據天地人的生發關係，人道是由天道生發出來的，因此天道決定著人道。

在《易傳》的宇宙觀中，天地人三者皆是無常的，其本質特徵就是變化。《繫辭下》云：“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可見，《易傳》所描述的宇宙是一個變動不居的時空系統，人既處在這個系統之中，又受制於這個系統，而這個時空系統本身所具備的規律，就成了制約人的“道”。所謂“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繫辭下》），正因為萬事萬物是變動不居、瞬息萬變的，這就帶來了吉凶悔吝的問題。當弱小的生命個體在面對大自然的不確定性時，人與環境之間構成了一對尖銳的矛盾，人如何把握這個變化多端的世界？又如何與這個世界達成和解？《易傳》給出的答案是“與天地合其德”，也就是遵循天地之道。在《易傳》中，天道、人道、易道三者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繫辭》曰：“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因此，易道與天地之道具有一種同源同性的關係，所謂“易與天地准，故能彌綸天地之道”。聖人畫卦的目的就在於把握天地之道，因此易道本身就是天地之道的“摹寫”，易道即天道，程頤說“唯盡天理，便是易也”¹⁴ 正是此意。所謂“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善易者通過觀象玩辭，可以窺見天道，從而指導人的行為。在《周易》中，“中道”是天命的體現，遵“中道”而行又是人的德性，因此可以說“中道”本

12 王弼、孔穎達，《十三經注疏·周易正義》，頁289。

13 朱熹，《周易本義》，頁240。

14 程顥、程頤，《二程集》，頁31。

質上就是遵天命而為。舉《無妄》卦為例，其彖辭曰：“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無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佑，行矣哉？”，“大亨以正”的原因是天命所佑，而天命所佑的原因又在於“剛中”而有應，仍然是不離“中道。”，“中道”既是天道，那麼“中以行之”也就具有了最大的合理性，自然是“吉無不利”了。

總體來看，《周易》中所構畫的宇宙生成論具有強烈的道德色彩，太極或天道並不是純粹自然論的宇宙本源，而是蘊含著道德意味的宇宙本體，因而可以看做道德論的宇宙觀。《象》云“聖人以神道設教”，《易傳》中所確立的道德宇宙論模式，並沒有否定《易》古經中“天”的地位，而是通過宇宙論的說明來揭櫫道德的崇高價值，同時說明君子尊道修德的合理性，這的確具有“神道設教”的意味。《易傳》的這一宇宙論的詮釋路徑主要為後世象數派易學所繼承。

其次，《易傳》除了從宇宙論的角度來說明德行與吉凶之間的關聯，更為重要的是本體論的詮釋路徑，其主要思路是將道德上升至本體的層面，並將德行與吉凶直接聯繫起來，從而完善《周易》“德福一致”的邏輯之鏈。

作為宇宙本源的“天”，在先秦典籍中常具有本體的意義，是正義之源，亦是至德、至善的標誌，如《詩經》所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明明上天，照臨下土”等，都是歌頌作為至德、至善的“上天”，在《易傳》中亦同樣如此。但《易傳》中的天雖然超越在上，卻不是一個無所不在、無所不能的存在，其“全體之大用”仍須通過人才能發揮作用，這與西方基督教神學是不同的。基督神學的超越之路指向一個無所不能的上帝，上帝的救贖就是最終的正義審判，也是“德福一致”的保證，而《易傳》所揭示的道德形而上學並不向外去尋求上天的救贖，而是反求諸己，向內開掘道德之源，所謂“和順于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說卦傳》），其最終目的仍是為了證成這個道德的有效性。雖然上天沒有救贖的功能，但人道的合法性仍須建基於天道之上，抽離了天道，人道就成了無根之木、無源之水，只剩下一堆沒有說服力的道德格言。職是之故，天道與人事須在雙向互動中才能展開各自的意義。從這個意義來看，《易傳》所揭示的天道可以理解為人道的某種“隱喻”，天道最終是要為人的目的來服務的。因此，從根本上講，天道即人道，人道亦即天道，二者相即不離，這也就是“天人合一”。《繫辭上》云：“與天地相似，故不違。”人的行為若處處與天道相合，那麼天也不違背他，這就是“自天佑之，吉無不利”的深層意蘊。既然“與天地相似，故不違”這一條規律能夠得到確證，那麼德福之間的一致性亦可由此得到確定。反過來看，天道存在的合法性，也在於保證德福之間的一致，即俗話所說的“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如果善無善報或者善有惡報，那麼上天也就失去了它的合法性，也就不能成其為“明明上天”了。這實際上是將人的德性上升到了上天的高度。德性具有了本體的內涵，天命必然反以人的德行為轉移，在此基礎上，遵守“中道”從而實現趨

吉避凶也就順理成章了。這就是《周易》“中道”觀背後的行動邏輯。可以說，無論是“中正”，還是“時中”，都是教人在複雜變動的環境下遵循天道的規律行事，因此與其說“中道”的內在理路是要求人奉行天的意志，毋寧說人須尊奉道德的律令行事。

既然道德本身具有了本體的意義，那麼以道德代替上天，建立系統的道德形而上學也就是水到渠成的了。實際上，通過道德形而上學來說明德福之間的一致性，這一詮釋路徑主要為義理派所繼承和發展。從王弼到程頤所奠定的義理易學，都從卦爻的結構中揭櫫“中道”的哲理，並都以道德範疇取代天命，在超越的本體層面來尋求溝通德與福的根據，從而打通天人之間的隔閡，並由此奠定內在超越的身心性命之學的基礎，這使得秦漢以來的儒家從宇宙生成論走向性命之學成為可能。兩宋以前，這一道德形而上學的詮釋路徑並沒有充分發展出來，其主要原因在於沒有發展出十分系統而自治的本體論，雖然這個本體的概念很容易從其論述中推論出來。更為嚴格的形上論證是由宋儒完成的。周敦頤首開道學一脈，他將人性解釋為“中正仁義”，確立了以“中正仁義”為核心內容的本體論，從此“中道”思想具有了明確的本體論說明。二程發揮周子之說，提出了“天者，理也”的理本論，他們用理代替了天作為最高範疇，以解釋萬事萬物的法則以及綱常倫理，從而構建了基於“理”的新儒學體系，這一思路對後世產生了巨大影響。程頤對《周易》“中道”思想發揮尤多，他提出“天下之理莫善於中”、“中即道也”¹⁵等命題，指出“凡學之道，正其心，養其性而已。中正而誠，則聖矣。”¹⁶將“中道”視為大道之本，¹⁷視為修身、養性、治學的核心要素，這既是程頤學說的扼要之論，也是他的深刻體會。朱熹、王陽明等大儒都對“中道”思想有過相關論述，並且無一例外的都是延續二程所開創的道德形而上學的路徑來說明道德與吉凶之間的關係。當代新儒家對“中道”思想也有所發揮，例如唐君毅先生說：“儒者之盡性立命之道，在根本上乃一中正而圓融之道。中則不偏，正則不邪，是見中道之體。”¹⁸唐先生視“中道”為儒家人格的一種本質特徵，這是很有見地的。牟宗三對“中道”的論述更多，他的圓善論很大程度上就是為了解決德福一致的難題而建立的，他以無限智心來說明“圓善”之所以可能的根據，並由此建立起一整套道德形而上學，從而證成德與福之一致，這是《周易》德福問題在現代的一個重要解決方案，也是對康德道德形而上學的一個重要發展。當然，無論是牟先生還是康德，其討論的“德福一致”都是在超現象的層面談論的，這與《周易》試圖溝通本體與現象兩個層面是不同的。

15 程顥、程頤，《二程集》，頁606。

16 程顥、程頤，《二程集》，頁577。

17 《中庸》云：“中者，天下之大本。”程頤對此一語做了十分精彩的發揮，詳見《與呂大臨論中書》一文。

18 唐君毅，《生命存在與心靈境界》，頁607。

總而言之，“中道”觀導源于《周易》古經的卦爻辭，在《易傳》中上升為君子之德，在孔子那裡又提煉為中庸之道，到了宋儒這裡，則又變為挺立道德主體的價值之源，成為新儒學的道德本體。儒家對《周易》“中道”的繼承和發揮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可以說“中道”思想從未離開過儒家思想的詮釋傳統，後世儒家無需再像《易經》那樣借助吉凶悔吝來闡發“中道”，而是直接將其確立為生命和道德之信仰，但究其根源，這與《易經》立命崇德的精神傳統仍是一脈相承的。

■ 投稿日：2015.09.29 / 審查日：2015.10.13-2015.11.20 / 刊載決定日：2016.01.06

參考文獻

- 程顥、程頤，《二程集》，王孝漁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1。
- 程頤，《周易程氏傳》，北京：中華書局，2011。
- 高亨，《周易大傳今注》，山東：齊魯書社，1979。
- 黃壽祺、張善文，《周易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 惠棟，《漢易學·易尚時中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 康德，《道德形而上學》，張榮、李秋零譯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
- 孔穎達，《十三經注疏·周易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 來知德，《來氏易注》，胡真校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 劉寶楠，《論語正義》，高流水注解，北京：中華書局，1990。
- 李光地，《周易折中》，北京：九州出版社，2002。
- 牟宗三，《圓善論》，吉林：吉林出版社，2010。
- 錢大昕，《潛研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 唐君毅，《生命存在與心靈境界》，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
- 王弼，《王弼集校釋》，樓宇烈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80。
- 張載，《張載集》，北京：中華書局，1978。
- 趙歧，《孟子注疏》，孫奭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 朱熹，《周易本義》，北京：中華書局，2009。

Zhongdao 中道 (Middle Path) and Fortune in the *Yijing* 易經: The Moral Metaphysics of the *Yijing*

MA Jun

Abstract

Zhongdao 中道 (middle path) refers the middle lines in the hexagrams in the *Yijing* 易經, the second or fifth positions. *Zhongdao* includes the notions of *zhongzheng* 中正 (special middle point) and *shizhong* 時中 (temporal middle point). Most *zhongdao* lines in the hexagrams indicate good fortune with only a few *zhongdao* lines having been interpreted as presaging bad fortune. This kind of essentially positive approach to human life can be understood as a basis of moral philosophy in the Chinese tradition. The *Yijing* also has a tendency to relate cosmology and morality in order to make connections between virtuous behavior and good fortune. That is, the *Yijing* holds that moral self-cultivation can be justified by good fortune and psychological rewards. In this regards, the moral metaphysics of the *Yijing* asserts the unity between virtue and fortune, a conjunction which has had a huge influence on Confucian scholars throughout Chinese history.

Keywords: *Yijing* 易經, *zhongdao* 中道, moral philosophy and fortune, moral metaphysics, unity between virtue and fortune